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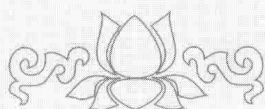
早期汉译佛经 词汇系统的结构及生成

——以支讖译经复音词为中心

张 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早期汉译佛经 词汇系统的结构及生成

——以支谶译经复音词为中心

张 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汉译佛经词汇系统的结构及生成：以支谶译经复音词为中心 / 张焯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9671 - 7

I. ①早… II. ①张… III. ①佛教 - 汉语 - 词汇 - 研究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1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 例

本书写作主要参考的语料库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所编写的“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光碟 2011”，所选例句源于电子版的《大正藏》。在例句的编写上，一般在一个例句之后附上经号栏次等信息。

同时，本书词语的释义主要源自中华佛典宝库所编写的“fodict 电子佛教词典”，主要参证的是丁福保编写的《佛学大辞典》以及陈义孝编写的《佛学常见辞汇》等。

此外还需说明一点，佛教是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的，在此期间出现了多位译师，佛经文献也层出不穷，我们从中选取了“大乘”佛法的译入者支娄迦谶（以下简称“支谶”）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他的 8 部译经中的词汇系统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归纳。为了便于与本土词汇作比较，本书所选取的复音词绝大多数都是早期译经所在时期的东汉新词，主要判定依据以罗竹风等编纂的《汉语大词典》（第一版）为蓝本。如果某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首引例出自东汉时期或者更晚时代的文献，那么我们就基本断定此词为东汉新词。如果这些新词不见于东汉时期的中土文献，那么我们将视其为佛源词语，尤其是支谶首创的词语在下文的写作中均会特别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佛经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及主要研究方法	(2)
一 研究对象	(2)
二 研究方法	(3)
第三节 本书所使用的语料及其成书年代的确定	(5)
第二章 支谶译经的词汇构成及历史来源	(11)
第一节 佛教专门词语	(12)
一 表达佛经中的特定称谓	(13)
二 表达佛经中的概念和义理	(16)
三 与佛教相关的活动用语	(18)
四 佛教中的常用物品和处所	(20)
第二节 专名用语	(22)
一 人名类	(23)
二 地名类	(24)
三 事物类	(25)
第三节 普通词语	(25)
第四节 支谶译经复音词的历史来源	(29)
一 承继先秦的复音词	(30)
二 承继西汉的复音词	(34)
三 承继东汉本土文献的复音词	(36)
四 东汉其他佛经以及支谶译经新创词语	(37)
第三章 支谶译经复音词的构造方式	(43)
第一节 确定复音词的判断标准	(43)

一	各家对于古汉语复音词的判断标准	(44)
二	具体的判定标准	(45)
第二节	联合式复音词	(48)
一	语义特点以及词例分析	(48)
二	词性构成分析	(86)
三	联合式复音词的总体特点	(93)
第三节	偏正式复音词	(94)
一	语义特点及词例分析	(95)
二	词性构成分析	(138)
三	偏正式复音词的特点	(141)
第四节	动宾式复音词	(147)
一	语义特点以及词例分析	(147)
二	动宾式复音词的特点	(152)
第五节	主谓式复音词	(153)
一	语义特点及词例分析	(153)
二	主谓式复音词的特点	(156)
第六节	述补式复音词	(156)
第七节	附加式复音词	(159)
一	前缀 + 词根	(159)
二	词根 + 后缀	(163)
第四章	支谶译经构词语素分析	(178)
第一节	语素的界定和分类	(178)
第二节	影响语素构词能力的因素	(180)
一	构词语素数量及分类统计	(181)
二	影响“高频语素”构词的因素	(183)
第三节	支谶译经中高频佛经语素项分析	(191)
第五章	支谶译经复音词的造词研究	(195)
第一节	语音造词	(195)
一	联绵词	(196)
二	语音重叠词	(199)
三	音译词	(203)
第二节	语素合成造词	(214)

一 合璧词	(216)
二 意译词	(222)
三 句法造词	(228)
四 “语素合成”造词中涉及的理据问题	(229)
第三节 修辞造词	(242)
一 比喻造词	(243)
二 借代造词	(251)
三 委婉造词	(253)
第四节 缩略造词	(254)
第五节 影响造词的因素	(262)
一 人的思维认识以及汉民族的文化心理	(262)
二 社会活动对造词的影响	(267)
三 语言自身对造词的影响	(268)
第六章 佛经词汇的历时演变研究	(270)
第一节 构词方式的历时演变	(270)
第二节 造词方式的历时演变	(276)
第七章 结语	(281)
主要参考文献	(283)
附 录	(29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佛经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综观能代表汉语发展的语料会发现,汉语词汇自东汉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除了受到汉语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在此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佛经汉译浪潮,前后持续了数百年,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汉文大藏经。佛教在影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对汉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为汉语增添了许多带有佛教因素的外来成分。这些成分有的直接融入了汉语中,也有的对汉语本身的词汇、语法等产生了“干扰”,这都使得汉译佛经文献成为汉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谈到佛经研究,主要考虑的是“佛学义理”“宗派”“哲学”等方面,自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后,佛经也被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而近三十年来,佛经文献由于具有“语言容量庞大、口语性强”等特点,逐渐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据《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以及近十年来的相关统计,国内发表佛经文献语言研究的论文9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部,其中从词汇角度进行研究的约占半数。这些论著涉及了词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由此也能看出学界对佛教语料的高度重视。

但是,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汉语词汇发展的正确认识和对以往研究的准确评价上,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汉语词汇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由什么原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往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采用了怎样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利用了哪些语言材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在

哪些方面还需要补充和拓展。以汉译佛经文献语言为代表的佛教汉语,是汉语历史文献语言中一个有着独特面貌和特征的变体。就词汇研究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我们也看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究所用的语料主要集中在隋唐时期。固然,此阶段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但是东汉作为中国译经事业的初创期,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例如,现存佛经有32部是东汉时期所译,数量多达上百卷。其中大乘佛法(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与小乘佛法(以安世高为代表)的首次译介都出现在这个时期。虽然东汉译经多是“外国人”所译,译经语言难免会受到自身语言系统的影响,但从这种“佛教混合汉语”中能窥见两种不同语言相互碰撞后留下的痕迹,许多口语化的词汇也能如实反映出当时的语言面貌,这对汉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有关佛经词汇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训诂的角度入手,学者们着力于具体词语的考释,或者采用抽样取证的方法分析其中的某个词汇现象。但是,对于译经初创时期的词汇结构及生成缺乏系统性的认识,这样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佛经词汇的产生和发展。

最后,佛教传入对汉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不同方面,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通过音译或意译等造词手段而产生的新词,很多词语也一直留存到了今天,影响可谓巨大。但是,佛教传入究竟如何影响汉语词汇的,其中的原语影响、语料价值到底有多大,早期汉译佛典的词汇面貌又是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及主要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语言,“佛教混合汉语”本身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它,其产生及发展的情况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佛教自东汉时期陆续传入我国,所以我们拟从东汉时期的佛经专书入手,进行细致的考察及分析。

之所以从佛经专书的角度来作词汇研究,是因为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专书一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何乐士先生曾对专书语法研究有过这

样的论述：“静态描写要求全面、穷尽、科学，这是专书语法研究的最低要求。因为专书语言资料相对来说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何乐士，2000）换句话说，通过详细的专书词汇描写可以展现汉语词汇发展到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面貌，尤其是通过专书词汇研究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历史阶段词汇的来源及其对后来词汇发展的影响。

同时，我们可以在对共时材料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历时分析。尽管我们在复音词的结构和生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某些方面仍缺乏全面、详细的探讨，也缺少理论的分析。例如，对专书词汇的历史来源尚缺乏全面的调查，因此对专书词汇的形成实际上只是一些典型词语发展的脉络线索，而在整体上仍是不甚清晰，因而也就缺少定量和定性的具有“史”的全面而详细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俞理明先生和谭代龙博士的《共时材料中的历时分析——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看汉语词汇的发展》一文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我们期望能够吸收以往研究的成功之处，弥补其不足之处，选取有代表性的专书，先做共时的词汇结构方面的描写，然后对这个共时平面中的所有复音词进行历时考察，并结合词汇学的有关理论和专书词汇的特点探讨复音词的生成和发展，进而在词义演变和疑难词语的考释方面也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拟从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入手，尤其是以“大乘”佛法译入者支娄迦谶8部佛经的词汇为研究重点，开展定性定量的研究，讨论佛教汉语词汇系统的结构、特点以及它是如何生成的，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佛经词汇的演变问题。

二 研究方法

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里，有关词汇结构和生成的相关成果较为丰富，其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并非每种方法都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例如，构词的研究基础主要是汉语“句法”，所以其结构形式的命名也是参考了现代的句法结构。再比方说，词汇的生成更注重语义和理据，所以许多体系也是深受现代语义学、认知语言学、修辞学的影响。如果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古代语料进行考察，虽然可以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但是必须要注意，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借鉴和应用，不能仅把语料从现代汉语换成古代汉语，原封不动地去考察。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特殊的词语，它们的结构形式或者造词手段在现代汉语中并

不多见，这就需要用一种历时的眼光进行分析。对于和现代汉语的语言体系有相出入的地方，也应该“量体裁衣”，找出更适合它们的新的研究方式。总体来说，结合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现代词汇研究越来越注重在对语言事实定性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因为这种对语料进行量化分析的方式，更加简洁直观，而且定量分析也要比抽取若干语例进行归纳的方式更具有说服力，这正如郭锡良先生曾说的：“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①

在我国，较早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有尹斌庸的《汉语语素的定量研究》，该文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汉语中的4871个单音节语素，并且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包括语素的词性、独立性以及结合性，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他的看法颇有启发性。此后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如周荐（1991）对《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中的双音词进行的定量分析、朱彦（2004）对4236条复合词进行的语义构词法方面的研究等。可以说，与定量相关的论著越发丰富，取得的成果也较为显著，因此，本书也将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二）解释与描写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也将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东汉时期佛经词汇的结构进行细致的描写，这样可以把佛经词汇的全貌完整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对“词汇生成的方式”“影响造词的因素”“构词模式的能产性”等诸多方面进行阐释。在解释的方式上则主要考虑人的认知以及现代语言学两方面的因素。这—是因为“词汇生成”涉及人的认知活动，是人们利用各种认知机制自行创造的新词，所以要结合汉族人的思维特点进行考察。二是因为任何机制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所以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来分析，可以使得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三）共时和历时相比较的方法

“词汇的构造方式”更倾向于共时研究，我们主要利用句法结构的相关理论对词进行分析，其间不考虑词语生成的历时过程，或者构词语素的语义发生变化的轨迹。虽然专书研究强调共时描写，但作为词汇史方面的

^① 郭锡良：《1985年的古汉语研究》，《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3期。

研究,我们也应该注意词语(包括词义)的历时演变情况。因为佛典翻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融合外来文化的工程之一”(朱庆之1996),也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而发生的一次“空前规模的语言大接触”(俞理明,2003),对汉文化和汉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单就汉语词汇来看,一系列的新词、新义应运而生,而且由此产生的孳生词、孳生义更是绵延不绝。因此,我们根据支谶译经复音词在历史文献中的生成情况来探求以其为代表的汉译佛经词汇的融合和变异,这种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使研究更加立体、全面。

第三节 本书所使用的语料及其成书年代的确定

东汉佛典的数量较多,学者们对此有过一些不同的论述,如朱庆之(1992)认为,东汉佛典共有80部,105卷,约84万字;俞理明(2005)则认为有30万字左右。^①据我们的统计,就现有的佛经材料来看,东汉时期的译师共有8位,所译佛经达32部之多。其中,安世高共有18部译经,支娄迦谶8部,安玄、严佛调2部,支曜2部,康孟详、昙果、竺大力合译2部,总数将近40万字。这些东汉时期的佛典又以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孟详、昙果、竺大力译经为主。下面对“大乘佛法”的译入者支谶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一) 支谶其人

佛经中历来有“大乘”“小乘”之分,主要区分依据在于它们的经典不同。其中大乘经典包含了小乘的部分,但小乘经典只承认《阿含经》,对《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并不认可。但是,如果分部类来说,它们都可分为“经藏、律藏、论藏”三种。而且,不论是 大乘还是小乘佛法,均是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的。基本来说,安世高被看作传译小乘佛法的第一人,他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来到中国,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而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来到中国的支娄迦谶则是最早传译大乘佛法的著名译师。其中,安世高译经虽然数目

^①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俞理明:《东汉佛道文献词汇研究的构想》,《汉语史研究集刊》(第8辑),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1页。

众多,但字数只有9万余字,如《禅行法想经》只有362个字,《佛说法受尘》只有377字,总数不超过千字的佛经共有6部之多。而支谶译经的8部共计20余万字,其中《道行般若经》共有10卷,是“般若部”的主体,在早期的译经中算是比较庞大的译著。而“宝积部”最重要的几个组成部分,即包括支谶所译的《宝积经》《般舟三昧经》以及《阿閼佛国经》。同时,通过我们的研究,支谶译经的语言与东汉较晚期出现的《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法镜经》较为相似,主要体现在众多相近的词汇上,可见,支谶译经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东汉时期佛经语言的面貌。而且,支谶经书的音译词是东汉佛经中数量最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梵文原本的语言特点,因而本书选用支谶译经作为研究对象。下文对他的生平以及译经情况做一简介。

支谶,原名支娄迦谶,是东汉时期月氏国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月氏国现处于我国甘肃西部敦煌、祁连山一带。该国在当时经历了“贵霜王朝”之后,^① 攻占了天竺,并且占有了整个印度西北地区,这使其成为南亚诸国中最为富盛的国家。月氏国人长期以来就比较热衷于佛学修道,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在这一环境的影响下,支谶也出家为僧,并在后汉桓帝末年从月氏国来到洛阳开始佛经的翻译工作。

据《高僧传》记载:“(支谶)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秉持法戒以精懃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由此可以看出,从汉桓帝(147—167年在位)至汉灵帝(168—188年在位)期间,支谶一直在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

支谶是大乘佛经传译的第一人,对他的翻译风格 and 特点,后世有诸多评价,比如:

僧祐论支谶:

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① “贵霜王朝”一般指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由大月氏贵霜翕侯部落建立,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曾拥有人口五百万,士兵二十多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罗马、安息并列。

(《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三,第511页)

支敏度论支谶:

其博学渊秒,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70页)

道安论支谶:

前人出经,支谶审得胡本难系者也……于九十章荡然无措疑处,豪盲之间,泯然无微疹。已矣乎!

(《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291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世对支谶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译经中一个明显的特点便是“文不加饰”。今人朱志瑜评述:“支谶是‘质’的代表,他所保留的原旨(音译)最多。”^①正是由于支谶恪守用语音来保存佛经原本,译经中音译词数量众多,所以他的作品初读起来较为艰涩。后代其弟子支亮、支谦继承发扬了他的学说,世人称为“三支”。而支谶作为“三支之首”,可见其修为精深,学问广博。

(二) 成书年代的确定

支谶一生所译众多,有关他所译经书及其具体数量,历代僧人有不同的记载,如:

慧皎《高僧传》:

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闍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岁久无录。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2059,324,2)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

^① 朱志瑜、朱晓农:《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十三部，凡二十七卷……其古品以下至內藏百品凡九經。安公云。似支讖出也。(2145, 6, 2)

唐《佛祖历代通载》:

至中平年凡二十一部。六十三卷。(2036, 509, 3)

唐《古今译经图纪》:

……阿閼佛国经(二卷)大集经(二十七卷)。般若道行品经(十卷)。首楞严经(二卷)。屯真陀罗尼经(二卷)阿閼世王经(二卷)无量清净经(二卷)李本经(二卷)。般舟三昧经(二卷)。古品遗日说般若经(一卷)。宝积经(一卷)。问署经(一卷)。梵般泥洹经(一卷)。阿閼世王问五逆经(一卷)兜沙经(一卷)。內藏百品经(一卷)。大方便报恩经(一卷)。光明三昧经(一卷)。禅经(一卷)。杂譬喻经(一卷)。阿育王太子坏目因缘经(一卷)。总二十一部合六十三卷。(2151, 348, 3)

虽然关于支讖译经数量的记载所述甚多，但是作者所处的年代不同，很可能导致得到的资料也不一致。同时，各个经书还可能具有异名。比如《问署经》，又名《文殊问菩萨署经》，《阿閼世王经》又名《阿閼贵经》，《宝积经》又名《摩尼宝经》，《內藏百品经》又名《內藏百宝经》。^①因而，以上这些因素均可导致支讖译经的确切数量以及具体的名称没有定论。

今人对此也进行过一些考证。如吕澂(2004)认为：“支讖译籍现存9种，缺本4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因为现有的译经中有许多亡佚，因而认定现存的九种为：年代可考的有《般若道行经》十卷(179

^① 该经文通过查找群录，发现均无《內藏百品》一名，而只有《內藏百宝》，可见二者当为同一经。

年译),《般若三昧经》二卷(179年译)。还有道安认为较像支谶所译的有:《阿闍世王经》二卷,《宝积经》一卷(又名《摩尼宝经》),《问署经》一卷,《兜沙经》一卷,《阿闍佛国经》一卷,《内藏百宝经》二卷。此外,支敏度还提到有《饨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再如许理和(1991)认为当有八种为支谶所译,它们分别是:《道行般若经》十卷,《佛说兜沙经》一卷,《阿闍佛国经》一卷,《般舟三昧经》三卷,《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一卷,《佛说遗日摩尼宝经》一卷,《阿闍世王经》二卷,《佛说内藏百宝经》一卷。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主要的差异在于对《饨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的确定上,其余数经基本保持一致。史光辉(2005)将其与《道行般若经》以及同样比较可靠的《般舟三昧经》进行对比,主要来自原典的一些词汇作为参考依据,例如《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中使用“优钵华”,而《饨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则用“优昙钵华”,再如《道》中使用“罗汉”,《饨》中没用省称,而是称“阿罗汉”。根据这些词汇上的差异,可以发现《饨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的语言特点与支谶译经不尽相同,因而基本可以认为非支谶所译。

另有《般舟三昧经》,流传至今的有一卷本(《大正藏》编号417)和三卷本(又名《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大正藏》编号为418)两种,内容虽然相近,但二者不能判断哪个当为支谶所译。汪维辉(2007)也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考证,例如支谶译经只用“阅叉”,而一卷本《般舟三昧经》中采用“夜叉”,再如一卷本用“般涅槃”,而三卷本则用“般泥洹”等。通过这些差异可以断定一卷本的《般舟三昧经》并非支谶所译,所以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也不包括一卷本《般舟三昧经》。

最终我们确定东汉时期支谶所译经书为以下八部:

- T 224 《道行般若经》,十卷。
- T 280 《佛说兜沙经》,一卷。
- T 313 《阿闍佛国经》,一卷。
- T 350 《佛说遗日摩尼宝经》,一卷。
- T 418 《般舟三昧经》,三卷。
- T 458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一卷。
- T 626 《阿闍世王经》,二卷。
- T 807 《佛说内藏百宝经》,一卷。

此外，这些佛经在后世译经中还出现了若干“同经异译本”，如《道行般若经》后世还有南吴支谦所译《大明度经》（编号 225）、秦昙摩蜚共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编号 226）、后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编号 227）等。再如《般舟三昧经》还有《拔陂菩萨经》（编号 419），隋阇那崛多译《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编号 416），其中《拔陂菩萨经》的译作者不可知。为了便于历时比较，我们在写作中也会参证支谶译经的“同经异译本”。